

近代女子教育萌芽¹之中日对比

-以近代国家建设的视角为中心-

王念家 (青岛大学)

【摘要】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国家建设宗旨的具体体现。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和1868年的明治维新分别拉开了中日两国近代国家建设的序幕。无论是实行“救亡图存”也好，还是“富国强兵”也罢，中日两国在建设近代国家时，都试图通过建立近代的教育体制完成对近代国家的构筑。而在这一过程中，女子教育也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得到了确立和发展。纵观历史，中日两国在近代国家建设的起因及目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而使得两国女子教育的发展道路随着国家建设宗旨的不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日本的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立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女子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目标来完成的。教育作为其中一大要项，女子教育包含其中。推动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母性角色，用以培养合格的国民。而中国的女子教育之路是在资产阶级维新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斗争。资产阶级维新派有着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意志意愿，却遭遇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虽然最终保守势力也被动地完成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变革，但却使得中国的近代女子教育之路走得漫长而又崎岖。

【关键词】近代女子教育；近代国家建设；中日对比

引言

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国家建设宗旨的具体体现。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和1868年的明治维新分别拉开了中日两国近代国家建设的序幕。无论是实行“救亡图存”也好，还是“富国强兵”也罢，中日两国在建设近代国家时，都试图通过建立近代的教育体制完成对近代国家的构筑。而在这一过程中，女子教育也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得到了确立和发展。纵观历史，中日两国在近代国家建设的起因及目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而使得两国女子教育的发展道路随着国家建设宗旨的不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日同为亚洲国家，深受“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影响。近代之前的女子教育，两国都长期将女子阻挡在官办教育体制以外，奉行“女子无学”。前近代女子教育

仅限于士大夫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中的“闺阁式”教育²。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日本到了江户后期，寺子屋的兴盛使女子教育得到了推动。据记载，明治初年，通过寺子屋接受教育的儿童数达到 74 万之多，其中女孩子大约有 14 万 8 千人，占 20%³。正如我们所知，教育思潮往往植根于社会状况。换言之，在近代以前的日本社会土壤中已经蕴含了近代女子教育萌芽的意识形态，为明治时期建立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打下了基础。

一、近代女子教育的萌芽

无论中日，最初的近代女子教育机构都开端于西洋式的教会女校。在时间上，中国开设教会女校远远比日本要早得多。鸦片战争后的 1844 年，英国东方妇女促进会的亚尔德西女士（Miss Aldersey）在刚刚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设立教会女塾，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⁴。而日本的第一所教会女校成立于明治维新以后的 1870 年，由美国人 Mary Eddy Kidder 起初以家塾形式创立的，后发展成为菲里斯（Ferris）和英女校⁵。虽然教会学校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以教义进行传教，但是教会学校的出现仍为中日两国的传统教育注入了一股新潮流，进而推动了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立。

（1）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开端

在日本，明治政府在建立初期就迅速确立了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教育体制的政策方向，尤其关注女子教育问题。1871 年 4 月，明治政府设置了教育行政的中央机构-文部省。同年 12 月，文部省颁布“计划设立女学校公告”，公告中指出“人昌其家业不论男女，而今男子有学，女子无学，故聘用西洋女教师，开设女校，华族至庶民缴纳学费入学”⁶。依据该公告，1872 年 2 月，创立了东京女学校，开官立女学校之先河。同年紧接着京都女学校、开拓使女学校等女学校相继创立⁷。这三所学校成为日本近代最早的官办女学校，标志着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开端。除了设立女学校，明治政府还于 1871 年 11 月，选派五名少女留美，开创了日本派遣女子留学生之先⁸。此外，于 1874 年设立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用以培养女性初等教员⁹。以上种种举措可以视为明治政府在建立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初步尝试。

1872 年 8 月，明治政府为了普及教育，颁布了近代史第一个教育法令---《学

制》。在此法令的九大目标中，实施女子教育被排在第3位，提出“一般女子男子均应受教育”¹⁰。法令中提倡全民皆学，并指出“华士族自农工商及女子”皆为受教育的对象，“幼童教育无男女之别”等规定¹¹。《学制》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教育法令，虽然还有许多未完备之处，但它明确了近代教育的意义，并且将女子教育纳入教育体制中，视子女就学为家长责任必须推行的做法在当时是进步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法令基于男女平等观之上，体现出了早期女子教育观念的进步性。可以说它不仅标志着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开端，更意味着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开端。

除官办女子学校以外，明治政府还鼓励教会办学。1873年，明治政府解禁了德川幕府以来实行了250多年的基督教传教禁令。自此，教会女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批借助教会与传教士的力量，以日本人为创办人建立起来的学校或是日本的教徒信仰者独立创办的女子学校也涌现出来。从1870年至1880年的这十年间，共立女学校，青山学院，樱井女学校，立教女学校，英和女学校，同志社女学校等知名女校相继在此期间创立¹²。这也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2)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立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不仅取得了口岸通商等经济利益，还获得了包括允许传教，开办教会学校等特权¹³。教会女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入到中国的。到1860年，在五个通商口岸及香港共创立了11所教会女校¹⁴。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教会女校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至1876年，基督教教会所办女日校已达82所，女生1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¹⁵。而天主教教会在江南一带也有女校213所，学生2791人¹⁶。教会女校的授课内容一直以《圣经》为主要内容，60年代以后，为了更好的融入中国社会，教会女校在课程设置里加入《四书》、《女儿经》等内容，并且也设置了化学、地理、生物、算术等“格致之学”¹⁷。据统计，到1902年教会女校的学生数已经占当时全国的43%¹⁸，并且20世纪初期教会女校已经包括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圣经学校，医科学学校，女子大学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善的女子教育体系¹⁹。

虽然教会女校的办学主旨在于“为传播福音开辟道路”²⁰，但是它依然开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先例，将西方的人权观念和科学知识带给中国女性。教会女

校的兴起以及传教士关于西方女子教育制度的宣扬²¹，促使了中国自办女学的诞生。

甲午中日之战的失败使维新派意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1896年，梁启超在《论女学》中力陈“兴女学”为强国第一要事。“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²²。宋恕、郑观应、康同薇、经元善等人也撰文呼吁效仿欧美，取法日本，提倡女子就学²³。1897年梁启超，经元善，郑观应等人开始筹划创办女校。梁启超在《创设女学堂启》中进一步阐述了女子教育的意义在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²⁴。在维新志士的倡议下，1898年，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女校——上海经正女学堂应运而生²⁵。遗憾的是由于戊戌变法失败，经正女学于1900年停办。虽是如此，自此以后，国人自办女校风气大涨，据1907年学部总务司所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除甘肃，新疆和吉林外，其他省份均设有女学堂，数量达到428所，女学生数15496人²⁶。

经正女学被清末保守势力所扼杀，与经正女学创办同年，清末重臣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认为“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对女子教育不置一词²⁷。1901年，内外交迫的清政府推行新政，学制改革迫在眉睫。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申学制”。但由于政治斗争，此学制并未实施。1904年，稍许改动后，重新颁布，史称“癸卯学制”。一般将二者合称为《壬申--癸卯学制》²⁸。这是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个学制，但仍对女子教育持极为保守的态度。认为“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主张依然把女学以家庭教育形式进行²⁹。可是改良风潮成为风气，1902-06年，私立女学不断涌现出来。京师、江南地区自不必说，甚至贵州、云南也不甘落后。面对不断出现的女子学校，1907年清政府终于颁布了《奏定女学堂章程》³⁰，正式承认女子学堂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至此，中国的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才算是被正式确立。《癸卯学制》学制的出台虽是被动的，但是它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存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发展。

二、近代国家建设与女子教育

教育体制的制定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往往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予以实施。从以上不难看出，中日两国在确立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时有着完全不同的过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在寻求答案时，我们不能不把视角投向中日两国近代国家建设的起因及目的上。

(1) 日本近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良妻贤母”

面对欧美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日本率先进行了社会变革，实行了明治维新。当时明治政府的最大课题是尽快建立统一的国民国家，维持国家独立。因此“富国强兵”、“增殖产业”就成为了日本近代国家建设的目的。实现这一建设目标时，投射在女子教育上呈现出“良妻贤母”的教育理念。

明治初期，政府在教育政策上实施“文明开化”的政策，积极吸收西方列国的先进教育理念。受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倡导，“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被明治政府接受。在“富国强兵”的国家建设方针下，颁布了《学制》。反映在女子教育的方针上，《学制》颁布之前，明治天皇就做了如下谕示：我邦女学之制尚未确立...此关乎幼童教导实为紧要...应知晓育儿法³¹。明治政府也认为“今日之女子乃他日为人母之女子”，而“其子才不才”深受“其母贤不贤”的影响。在初期的女子教育实践活动中，女子教育也富含了视女子为国民，建设近代国家的含义。例如，开拓使女学校设立的目的在于“毕业生许配男子部出身者，相携共赴北海道，永住此地，完成开拓之使命”；在“兴女学是教育人才之根本”这样的认识下派出少女赴美留学³²。

因此，《学制》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日本开始近代国民教育的标志。第二，视女子与男子平等，均为国民接受教育，进而为建设近代国家服务。第三，发展女子教育不止在于挖掘女性自身的潜力，更在于根据母性在家庭及育儿方面的特性，被赋予了培养优秀下一代国民的国家意志。

但是在《学制》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并不理想。针对此情况，明治政府及时调整政策，于1879年宣布废除《学制》，实施《教育令》。此法令规定的有关女子教育的内容甚少，对女子教育的发展也未起到有效的成果。1885年，伊藤博文内阁组成，森有礼出任文部大臣，他全心致力于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也就是以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思想为依据，建立起了一种立体式的近代教育体制³³。他对于女子教育明确指出：女子教育比男子教育重要。1887年，他在视察地方的教育情况时发表演说：“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中略）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之根本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³⁴。森有礼是国家主义教育的推行者，从实现国家

富强的角度认识女子教育，突出了女子教育的社会作用。

综上所述，日本在确立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时，“良妻贤母”的教育观念始终贯穿全过程。明治初期的“良母”概念意指和丈夫具有平等地位，并具备教育子女教养的女性形象，有强烈的欧式色彩。到了明治中期，随着天皇的《教育敕语》（1890年）的颁布，日本政府放弃了“文明开化”的教育理念，转而实施国家主义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反射在女子教育上，女性的柔顺，温和受到推崇。

“良妻贤母”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国家公认的教育理念。可以说，日本近代国家建设的宗旨是指导女子教育的方针，女子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也毫无疑问是为了实现近代国民国家建设的目标的。

（2）中国女子教育——在维新派与保守势力对抗中成长

对比日本，中国的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是在曲折中确立和成长起来的。它的发展历程与日本息息相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先，中国女子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缘于外侮所激，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使得当时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救亡图存之策。“甲午受创，渐知东学”，在以日为师的风气下，不但民间掀起留日热，甚至官员也赴日考察学习日本的近代国家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女子教育体制被国人认知。例如，1903年随夫出使日本归国的钱单士厘出版了《癸卯旅行记》，书中指出，“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根本原因在于重视教育”，而“论教育根本，女尤重于男”³⁵。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时，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尤其推崇学习日本“兴女学”，推行女子教育。梁在1896年发表《论女学》中提到：“中国二万万女子无知无识，分力困顿，是中国积弱的根本”。他认为“西方之强，日本之勃兴”，无不得益于女学强盛。因此维新派疾呼学习日本的“良妻贤母”的教育理念，发展中国女子教育。如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指出“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民男女6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³⁶。在游日官员，游学日本的留学人士，维新派的积极宣传下，日本的“良妻贤母”主义在中国日益兴盛起来。1904年颁布的《壬申-癸卯学制》几乎全盘模仿日本³⁷，原因在于日本的“和魂洋才”与清政府的“中体西用”有异曲同工之处，易于被当权阶级接受。

由此可见，中国的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立实际上是沿着日本的道路摸索前进的。从时间上来看，它深受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影响，也希冀以“兴女学”找到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道路。

但是，中日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立过程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与日本明治政府积极主动实施的社会变革不同，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完成这场变革的主要力量有两支：一支是最早进入中国并将西方女子教育实践带到中国的教会女子学校；另外一支来自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维新派及受其影响的有识之士。但在同时，保守势力成为顽强抵抗这股社会变化潮流的力量。这里的保守势力私以为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级一派，另一派则是沉淀了两千年的封建思想而未开化的社会风气。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中，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是被动的。

中国的近代女子教育发展之路一直不是当权阶级所代表的国家意志要求主动变革的。与日本不同，明治初期的女子教育是从“人权平等”的角度出发实施的。但在中国，“男女同等”的观念一直未被统治阶级及社会风气所接受。从 1844 年第一所内地教会女校开办到 1907 年《奏定女学堂章程》颁布，中国的近代女子教育之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甲午中日海战的失利，震惊朝野内外，有志之士在思索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道路时，才将目光转移到发展近代女子教育上来。发动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代表了当时的先进力量，可惜变法只维持了百天就宣告失败，保守势力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近代女子教育前进的脚步刚刚迈出去就退了回来。

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立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女子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目标来完成的。教育作为其中一大要项，女子教育包含其中。推动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母性角色，用以培养合格的国民。而中国的女子教育之路是在资产阶级维新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斗争。资产阶级维新派有着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意志意愿，却遭遇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虽然最终保守势力也被动地完成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变革，但却使得中国的近代女子教育之路走得漫长而又崎岖。

¹ 本文中“近代女子教育萌芽”特指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中日两国开始近代女子教育伊始的一段时期。故称之为萌芽。

-
- ² 在日本, 奈良、平安时代以来, 贵族阶层的女子教育往往由其母或其他女性长辈代而行之。除修身礼法外, 教育的内容包括诗文, 和歌, 书道, 音乐等技艺。见樱井役著『女子教育史』増進堂、1943年、pp4。中国明清以来, 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和京师地区的“士大夫家庭中, 女孩子接受的文字教育早已扩展到经史学习, 与其兄弟们并无二致”。见丛小平《从母亲到国民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 《清史研究》2003 (1)。
- ³ 樱井役[1943], pp4。
- ⁴ 真正意义上中国第一所教会女校是 1835 年, 由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实蜡 (Mrs.Gutzlaff) 女士在澳门创办的女塾, 此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女校。学界上普遍将 1844 年开办的宁波女塾定义为“第一”, 本文中称为“内地第一”。见孙邦华著《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pp306。
- ⁵ 于华《青鞮与近代日本女性问题》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年。
- ⁶ 樱井役[1943], pp14~15; 文部科学省『学制百年史』2013 年 11 月 10 日阅览。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595.htm)
- ⁷ 樱井役[1943], pp14-15。
- ⁸ 五名少女中最为年少的是当年 6 岁的津田梅子, 回国后她历任各女学校英文教师的同时积极推动日本女子教育事业。后创办“女子英学塾”(现名津田塾大学), 被评价为日本女子教育的先驱者。
- ⁹ 樱井役[1943], pp24。
- ¹⁰ 文部科学省主页『学制百年史』2013 年 11 月 10 日阅览。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582.htm)
- ¹¹ 文部科学省主页『学制百年史 資料篇』2013 年 11 月 10 日阅览。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943.htm)
- ¹² 于华[2008]; 文部科学省主页『学制百年史』2013 年 11 月 10 日阅览。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595.htm)
- ¹³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pp29。
- ¹⁴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三,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pp232。转引自孙邦华[2012], pp306。
- ¹⁵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485.转引自孙邦华[2012], pp306。

- 16 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 17 崔运武〈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浅析〉《史学月刊》1988(2)。
- 18 数据出自林乐知《五大洲女俗通考》，转引自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pp349。
- 19 杨慧〈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北方论丛》2002(6)。
- 20 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pp211。
- 21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泰西学校论略》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的《西学考略》都有专门的篇幅介绍西方女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King Allen)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发表了许多女子教育的文章，并且汇编了《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论述西方各国古今女俗。孙邦华[2012], pp307。
- 22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32年，pp37-44。
- 23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pp865-883。
- 24 梁启超著[1932]，pp19。
- 25 学堂专门招收8-15岁有基本读写能力的女子，课程设置中西各半。学生都来自“高等家庭”。所用经费大多为士绅阶级捐助。参见朱有瓛主编[1985]，pp885-909。
- 26 乔素玲著《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pp29。
- 27 李华兴[1997]，pp714。
- 28 同上，pp74-83。
- 29 同上，pp714。
- 30 同上，pp715。
- 31 桜井役[1943]，pp13-14。
- 32 同上，pp17。
- 33 朱文富，刘山〈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日本近代普及义务教育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1月。
- 34 李卓，张冬冬〈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发展原因探析〉《南开学报》，2012年第2期。

³⁵ 李华兴[1997], pp77。

³⁶ 宋恕〈变通篇·开化章第四〉《六斋卑议》敬乡楼刊, 1928年, pp18-19。

³⁷ 李华兴[1997], pp77。

参考文献

- 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 2.丛小平《从母亲到国民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清史研究》 2003 (1)。
- 3.崔运武〈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浅析〉《史学月刊》 1988 (2)。
- 4.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 5.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 6.李卓, 张冬冬〈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发展原因探析〉《南开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 7.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 中华书局 1932 年。
- 8.乔素玲著《教育与女性: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 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 9.孙邦华著《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 10.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
- 11.文部科学省主页 『学制百年史 资料篇』 2013 年 11 月 10 日阅览。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943.htm)
- 12.文部科学省主页 『学制百年史』 2013 年 11 月 10 日阅览。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567.htm)
- 13.杨慧〈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北方论丛》 2002 (6)。
- 14.樱井役著『女子教育史』 增進堂 1943 年。
- 15.于华《青鞮与近代日本女性问题》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年。
16. 朱文富, 刘山〈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日本近代普及义务教育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 年 1 月。

1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年。